

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邢義田 黃寬重 鄧小南 總主編  
康樂 彭明輝 主編

# 史學方法與 歷史解釋

---

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 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

康 樂 彭明輝 主編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總編輯：徐惟誠

社 長：田勝立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康樂,彭明輝主編.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 4

(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1/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主編)

ISBN 7 - 5000 - 7305 - 4

I. 史... II. ①康... ②彭... III. ①史學理論—中國—文集  
IV. K09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38919 號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阜成門北大街 17 號 郵政編碼:100037 電話:010 - 68315609)

<http://www.ecph.com.cn>

北京市智力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開本:635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張:27.75 字數:424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 - 5000 冊

ISBN 7 - 5000 - 7305 - 4/K · 456

定價:46.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可與出版社聯系調換。

## 出版說明

《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是數十年來臺灣學者在中國史領域代表性著述的匯編。叢書共分十三個專題，多角度多層面地反映海峽對岸中國史學的豐碩成果，如此大規模推介，在大陸尚屬首次。

叢書充分尊重臺灣學者的觀點、表達習慣和文字用法，凡不引起歧義之處，都儘可能遵照原稿。作者觀點與大陸主流觀點不同之處，請讀者審別。由於出版年代、刊物、背景不同，各篇論文體例不盡相同，所以本叢書在格式上未強求統一，以保持原作最初發表時的風貌。各篇論文之後都附有該論文的原刊信息和作者小傳，以便讀者檢索。

在用字方面，既尊重原作者的用法，又充分考慮到海峽兩岸不同的用字和用詞習慣，對原稿用字不一致的情況進行了一些處理。

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敬請方家指正。

論叢編委會

2005年3月

# 總序

邢義田

爲了增進海峽兩岸在中國史研究上的相互認識，我們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支持下，從過去五十年臺灣學者研究中國史的相關論文選出一百七十八篇，約五百三十萬言，輯成《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十三冊。

十三冊的子題分別是：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制度與國家、政治與權力、思想與學術、社會變遷、經濟脈動、城市與鄉村、家族與社會、婦女與社會、生活與文化、禮俗與宗教、生命與醫療、美術與考古。這些子題雖不能涵蓋臺灣學者在中國史研究上的各方面，主體應已在內，趨勢大致可現。

這十三冊分由研究領域較爲相近的青壯學者一或二人擔任主編，負責挑選論文和撰寫分冊導言。選文的一個原則是只收臺灣學者的或在臺灣出版的。由於是分別挑選，曾有少數作者的論文篇數較多或被重複收入。爲了容納更多學者的論文，主編們協議全套書中，一人之作以不超過四篇、同一冊不超過一篇爲原則。限於篇幅，又有不少佳作因爲過長，被迫抽出。這是選集的無奈。另一個選錄原則是以前期出版者爲主，以便展現較新的趨勢和成果。不過，稍一翻閱，不難發現，各冊情況不一。有些收錄的幾乎都是近十餘年的論文，有些則有較多幾十年前的舊作。這正好反映了臺灣中國史研究方向和重心的轉移。

各冊導言的宗旨，在於綜論臺灣中國史研究在不同階段的內外背景和發展大勢，其次則在介紹各冊作者和論文的特色。不過，導言的寫法沒有硬性規定，寫出來各有千秋。有些偏於介紹收錄的論文和作者或收錄的緣由，有些偏於介紹世界性史學研究的大趨勢，有些又以自己對某一領域的看法爲主軸。最後我們決定不作統一，以保持導言的特色。這樣或許有助於大家認識臺灣史學工作者的多樣風貌吧。

此外必須說明的是所收論文早晚相差半世紀，體例各有不同。我們不作統一，以維持原貌。有些作者已經過世，無從改訂。多數作者仍然健在，他們或未修改，或利用這次再刊的機會，作了增刪修訂。不論如何，各文之後附記原刊數據，以利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查考。

半個多世紀以來，海峽兩岸的中國史研究是在十分特殊的歷史境遇下各自發展的。大陸的情況無須多說。<sup>〔1〕</sup>臺灣的中國史研究早期是由一批1949年前後來臺的文史和考古學者帶進臺灣的學術園地如臺灣大學、師範大學（原稱師範學院）和中央研究院的。<sup>〔2〕</sup>從1949到1987年解除戒嚴，臺灣學界除了極少數的個人和單位，有將近四十年無法自由接觸大陸學者的研究和考古發掘成果。猶記在大學和研究所讀書時，不少重要的著作，即使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出版的，都以油印或傳抄的方式在地下流傳。出版社也必須更動書名，改換作者名號，刪除刺眼的字句，才能出版這些著作。在如此隔絕的環境下，臺灣史學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走在馬克思理論之外。

臺灣史學另一大特色則是追隨一波波歐美流行的理論，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套對中國史發展較具理論或體系性的說法。記得六十年代讀大學時，師長要我們讀鄧之誠、柳詒徵、張蔭麟或錢穆的通史。幾十年後的今天，大學裏仍有不少教師以錢穆的《國史大綱》當教本。<sup>〔3〕</sup>中國通史之作不是沒有，能取而代之以的竟然少之又少。說好聽一點，是歷史研究和著作趨向專精，合乎學術細密分工和專業化的世界潮流；說難聽點，是瑣細化，少有人致力於貫通、綜合和整體解釋，忽略了歷史文化發展的大勢和精神。

這一趨向有內外多方面的原因。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學者之中，並不缺融會古今、兼涉中外的通人。然而初來臺灣，生活艱

〔1〕 可參遼耀東《中共史學的發展與演變》，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79年；張玉法《臺灣兩岸史學發展之異同（1949～1994）》，《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8（1994），頁47～76。

〔2〕 在日本統治臺灣的時期，臺灣唯一一所高等學府是臺北帝國大學。臺灣收復後，日籍研究人員離臺，仍在臺大的教員有楊雲萍、曹永和、徐先堯等少數人。但他們的研究此後並沒有成為主導的力量。請參高明士、古偉瀛編著《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臺北：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年，頁3。

〔3〕 參高明士、古偉瀛編著《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頁6。

困，爲了衣食，絕大部分學者無法安心治學著述。加上形格勢禁，爲求免禍，或噤而不言，不立文字；或退守象牙之塔，鉅釘補注；或遠走海外，論學異邦。這一階段臺灣百廢待舉，學校圖書普遍缺乏，和外界也少聯繫。新生的一代同樣爲生活所苦，或兼差，或家教，能專心學業者不多。唯有少數佼佼者，因緣際會，得赴異國深造；七八十年代以後陸續回臺，引領風騷，才開展出一片新的局面。

除了外部的因素，一個史學內部的原因是早期來臺的學者有感於過去濫套理論和綜論大勢的流弊，多認爲在綜論大局之前，應更審慎地深入史料，作歷史事件、個人、區域或某一歷史時期窄而深的研究，爲建立理論立下更爲穩固的史實基礎。早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陶希聖經歷所謂社會史論戰之後，即深感徒言理論之無益，毅然創辦《食貨》月刊，召集同志，爬梳史料。本於同樣的宗旨，1971年《食貨》在臺灣恢復出刊，成爲臺灣史學論著發表的重要陣地。來臺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的帶領下，也一直以史料工作爲重心。

這一走向其實正和歐美史學界的趨勢相呼應。二十世紀之初，除了馬克思，另有史賓格勒、湯恩比等大師先後綜論世界歷史和文明的發展。此一潮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漸漸退去，歷史研究趨向講求實證經驗，深窄專精。以檔案分析見長的德國蘭克(L. V. Ranke)史學，有很長一段時間成爲臺灣史學的一個主要典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後整理出版了《明實錄》和部分明清檔案，後者的整理至今仍在進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先生的率領下，自1957年起整理出版了《海防檔》、《中俄關係史料》、《礦務檔》、《中法越南交涉檔》、《教務教案文件》等一系列的史料；臺灣大學和政治大學則有學者致力於琉球實案和淡新檔案的整理和研究。基於以上和其他不及細說的內外因素，臺灣的歷史學者除了錢穆等極少數，很少對中國史作全盤性的宏觀綜論。<sup>〔4〕</sup>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是臺灣史學發展的關鍵年代。外在環境雖然荊棘滿佈，但已脫離初期的兵荒馬亂。經濟快速起飛，學校增加，設備改善，對外交流日益暢通，新的刺激源源而入。以臺大爲例，

〔4〕 參張玉法，前引文，頁76。

七十年代初，研究圖書館啓用，教師和研究生可自由進入書庫，複印機隨後開始使用，大大增加了隨意翻書的樂趣和免抄書的方便。六七十年代在中外不同基金會的資助下，也不斷有中外學者來校講學。猶記大學時聽社會學家黃文山教授講文化學體系。他曾應人類學巨子克魯伯（A. L. Kroeber）之邀，任哥倫比亞大學客座學人，也曾翻譯社會學名家素羅金（P. A. Sorokin）的《當代社會學》、《今日社會學學說》和李約瑟（J. Needham）的《中國科學與技術史》等名著。聲名如雷，聽者滿坑滿谷。研究所時，則聽以寫《征服者與統治者：中古中國的社會勢力》（*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著名的芝加哥大學歷史教授艾柏哈（Wolfram Eberhard）講中國社會史。

除了正式的課程，校園內演講極多。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言論的尺度稍見放寬，一些勇於挑戰現實和學術的言論、書籍和雜誌紛紛在校園內外，以地上或地下的形式出籠。以介紹社會科學為主的《思與言》雜誌自1963年創刊，曾在校園內造成風潮。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幾乎成為歷史系學生必修的課程，儘管大家不一定能會通消化。走出充滿科學主義色彩的教室，於椰子樹下，月光之中，大家不是爭論沙特、老、莊，就是膜拜寒山、拾得。邏輯實證論、存在主義、普普藝術和野獸派，風靡一時，無數的心靈為之擺蕩在五光十色的思潮之間。屢禁屢出的《文星》雜誌更帶給青年學子難以言喻的刺激和解放。以個人經驗而言，其衝擊恐不下於孫中山出洋，見到滄海之闊、輪舟之奇。臺灣內外的形勢也影響著這時的校園。“文化大革命”、反越戰、萌芽中的婦女解放和政治反對運動，曾使校園內躁動不安，充滿虛無、飄蕩和萬流競奔的景象。

這一階段臺灣史學研究的主流風氣，除了延續史料整理的傳統，無疑是以利用社會科學、行為科學的方法治史，或以所謂的科際整合為特色。在研究的主題上有從傳統的政治史、制度史轉向社會史和經濟史的趨勢。這和1967年開始許倬雲主持臺大歷史系，舉辦社會經濟史研討會，推動相關研究；陶希聖之子陶晉生在臺大歷史研究所教授研究實習，支持食貨討論會，有密切的關係。1978年張玉法出版《歷史學的新領域》，1981年康樂、黃進興合編《歷史學與



社會科學》，可以作為這一時期尋找新理論、探索新方向努力的象徵。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和法國年鉴學派的理論大為流行。1979年創刊的《史學評論》不但反省了史學的趨勢，也介紹了年鉴學派、心態史學和其他新的史學理論。從1984年起，康樂主持新橋譯叢，邀集同志，有系統地翻譯韋伯、年鉴學派和其他歐美史學名著。這一工作至今仍在進行。約略同時，一批批在歐美教書的學者和留學歐美的後進，紛紛回臺，掀起一波波結構功能論、現代化理論、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化研究的風潮。1988年《食貨》與《史學評論》先後停刊，1990年《新史學》繼之創刊。1992年黃進興出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1993年周櫟楷出版《歷史學的思維》，2000年古偉瀛、王晴佳出版《後現代與歷史學》。臺灣史學研究的理論、取向和題材從此進入更為多元、多彩多姿的戰國時代。仔細的讀者當能從這套書的不同分冊窺見變化的痕跡。<sup>[5]</sup>

曾影響臺灣中國史研究甚巨的許倬雲教授在一篇回顧性的文章裏說：“回顧五十年來臺灣歷史學門的發展軌跡，我在衰暮之年，能看到今天的滿園春色，終究是一件快事。”<sup>[6]</sup>在2005年來臨的前夕，我們懷著同樣的心情，願意將滿園關不住的春色，獻給海峽對岸的讀者。

2004年12月

[5] 請參本叢書《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彭明輝所寫《導論：方法、方法論與歷史解釋》；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出版，2002年。

[6] 許倬雲《錦瑟無端五十弦——憶臺灣半世紀的史學概況》，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五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年，頁14。

# 導 言

彭明輝

## 一、引 論

1945~2000年臺灣地區的歷史學研究，主要內容為何，關注點為何，是許多歷史學工作者關心的課題。有關臺灣地區史學研究取向的討論，約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對史學理論、方法與方法論的討論興趣較為濃厚；<sup>[1]</sup>另一種是以較宏觀角度對臺灣史學進行整體性討論。<sup>[2]</sup>

臺灣史學主要受到四方面的影響：（一）日治時期臺灣的歷史研究；（二）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三）歐美/西方史學的輸入；（四）臺灣史學工作者的自覺。

李東華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指出，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的主要淵源有二：（一）日治時期臺灣的歷史研究；（二）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發展。<sup>[3]</sup>李東華教授的另一篇論文《中華民國歷史學博士論文內容及方法之評析》，分析

[1] 如黃俊傑、李東華、林正珍教授等人的研究，相關著作如：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上，《漢學研究通訊》2.2（臺北，1983.04），頁69~76；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下，《漢學研究通訊》2.3（臺北，1983.07），頁135~145；黃俊傑《戰後臺灣關於史學方法論的研究（1950~1980）》，收入黃俊傑《戰後臺灣的教育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頁29~99；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臺北，1984.10），頁36~43；林正珍《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漢學研究通訊》20.4（臺北，2001.11），頁6~17。

[2] 如杜正勝、林滿紅、宋晞、王晴佳教授等人的研究，相關著作如：杜正勝《中國史在臺灣研究的未來》，《歷史月刊》92（臺北，1995.09），頁79~85；林滿紅《當代臺灣的史學與社會》，《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臺北：麥田出版，2002），頁169~176；宋晞《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上午在中國歷史學會年會上講》，《國史館館刊》復刊21（臺北，1996.12），頁1~26；王晴佳《臺灣史學的“變”與“不變”：1949~1999年》，《臺灣大學歷史學報》24（臺北，1999.12），頁329~374。

[3]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頁37~38。

1971~1983年間三十九篇歷史學博士論文的師承、斷代分布、專史領域與方法，說明三十九篇歷史學博士論文除一篇為韓國史外，其餘三十八篇均為中國史；其中以宋史為題的最多，佔十篇；其次為近現代史，佔九篇；在專史分布上，政治軍事史佔十二篇，比例最高；其次為經濟史六篇，社會史四篇，說明社會經濟史有逐漸風行之勢。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臺大歷史研究所早年的博士論文研究生相約研究史學史，分別為：阮芝生研究司馬遷、逯耀東研究魏晉史學、張元研究宋代史學，加上後期陳錦忠研究先秦史學，這項對中國史學史的集體研究，是臺大博士論文的最大特色。李東華教授指出，從歷史學博士論文的內容分析，有兩點值得注意：（一）解釋史學取代了史料學派；（二）論文取材的史料範圍明顯擴大。在研究方法上，雖然未見大量使用社會科學方法，但因解釋史學觀念的確立，歷史學博士論文採擇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是必然的趨勢。<sup>[4]</sup>

杜正勝教授的《中國史在臺灣研究的未來》一文，將臺灣地區的史學工作者分為四代：（一）第一代學者：1945年以後來臺的史學工作者，研究方法基本上以史料學派為基礎。（二）第二代學者：1960~1970年代的史學工作者自國外帶回許多新的觀念，最突出的是援引社會科學方法到歷史學領域。（三）第三代學者：1970年代以後到1980年代之間，在介紹外國理論時較不生吞活剝，顯示臺灣史學界對1960~1970年代迷信方法論的反省。（四）第四代學者：1990年代臺灣史學界發生較大的變化使臺灣史研究蔚為風尚。<sup>[5]</sup>

杜正勝教授另一篇回顧臺灣史學動向的論文《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原係2002年5月在劍橋大學東方研究系“川流講座”（Chuan Lyu Lectures 2002）的演講，<sup>[6]</sup>杜正勝教授將臺灣史學分為五個截點加以分析：（一）臺灣史學的起點——1950年；（二）史學以真為本務——傅斯年與史語所；（三）史學反

[4] 李東華《中華民國歷史學博士論文內容及方法之評析》，《史學評論》8（臺北，1984.07），頁121~149。

[5] 杜正勝《中國史在臺灣研究的未來》，《歷史月刊》92，頁80；李東華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認為“臺灣史的研究始終有良好的發展”，與杜正勝教授的說法略異。參見：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頁40。

[6]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收入杜正勝《新史學之路》（臺北：東大圖書公司），頁3~21。

映時代精神——沈剛伯；（四）社會科學方法進入史學——許倬雲和《食貨》；（五）物質、社會與文化有機聯繫的“新史學”。杜正勝教授在演講中指出：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變革，有其內在理路，亦與外緣的政治社會情勢密切關聯。臺灣史學的第一代學者於二次大戰後來自中國大陸，傅斯年強調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沈剛伯認為史學研究不應與社會脫節；1970～1980年代引進社會科學方法，昌盛社會經濟史的研究；1980年代以後，臺灣史學界出現新的趨勢，形成以社會經濟為基礎的文化史；1990年青壯代史學工作者創辦《新史學》，嘗試推動新領域、新課題的史學研究，此為臺灣史學發展的內在理路；而1990年代臺灣地區完成民主化，對史學發展造成的衝激遠較過去任何史學思潮或方法更深刻。五十年來臺灣以中國史為中心的史學教育與研究不得不重新檢討，而臺灣史學何處去？臺灣史家當如何安身立命？在歷史學社群內部的意見變得相當分歧，甚至成為敏感的政治問題。處在轉變的關鍵時刻，杜正勝教授認為下一波的新史學運動將不再是史家技藝的探索，而是史家心態的解放。如何突破長久以來的習慣與束縛，重新建構世界性的歷史視野，為長年永續的實證研究開闢一條新路。<sup>[7]</sup>

林滿紅教授的《當代臺灣的史學與社會》指出當前臺灣歷史學界的幾個現象：（一）以中國為思考範圍，無法突破舊有的框架；（二）研究著重古史，近代史研究又不講求歷史解釋；（三）忽略現在與過去對話及史學整體性的方法論問題；（四）史學研究與社會脫節。林滿紅教授在文中提出四項建議：（一）促請立法院趕快通過檔案法；（二）建立公報、報紙等資料光碟，鼓勵全民寫史；（三）調整與史學相關的獎評、昇等、聘任辦法；（四）加強當代臺灣歷史的研究實習。<sup>[8]</sup> 林滿紅教授的論文大體指出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的一般現象，其中以中國史為思考範圍，無法突破舊有的框架，尤指出問題關鍵所在；加強當代臺灣歷史的研究實習部分，在1990年代以後已有明顯改善；其餘所論大抵勾勒出臺灣史學研究的一般現象及

[7]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新史學之路》，頁17～21。有關建構世界性的歷史視野，林滿紅教授亦有深刻的觀察，參閱林滿紅《以世界框架寫中國人的近代史》，《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頁177～202。

[8] 林滿紅《當代臺灣的史學與社會》，《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頁144～168。

缺失所在。

宋晞教授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將臺灣史學與現代中國史學放在同一範疇中討論，而以史料的發掘和各領域史學研究論著為論述主軸。<sup>[9]</sup>

2002年7月7日中國歷史學會召開第三十八屆年會，舉辦“近年史學新趨勢座談會”，引言人分別是劉翠溶教授（臺灣史）、李東華教授（中國史）、王琪教授（西洋史），對臺灣地區1980年代以後的歷史學研究做了綜合性的討論。劉翠溶教授將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的臺灣史博、碩士論文，依所別和專史分析比較，對了解臺灣史研究的動向，具有指標性的意義；<sup>[10]</sup> 李東華教授的引言延續其《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論點，<sup>[11]</sup> 並補強1980年代以後的相關發展，說明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對壘的最新趨勢，以及後現代史學對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的衝激。<sup>[12]</sup>

2002年王晴佳教授出版《臺灣史學五十年》，從外部分析1945年以後臺灣地區歷史學的發展。<sup>[13]</sup> 王晴佳教授將臺灣史學分為三期討論：（一）1950～1960年代中期：為臺灣史學的初創時期，主要受到兩方面的影響：1. 史料學派；2. 冷戰的政治環境。（二）1960年代中期至1987年：主要受社會科學與現代化理論的影響。（三）1987年以後：政治的禁令解除，加上史學研究禁區的開放，臺灣史學進入蓬勃發展期。<sup>[14]</sup>

從李東華、杜正勝、林滿紅、宋晞、王琪、劉翠溶、王晴佳教授的論析，約略可以看出臺灣史學的一般概況，其中影響臺灣史學研究的四個面向，即（一）日治時期臺灣的歷史研究，（二）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三）歐美/西方史學的輸入，（四）臺灣史學工作者的自覺，亦昭然若揭。在這些面向中，我們看到受外來影響的

[9] 宋晞《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上午在中國歷史學會年會上講》，《國史館館刊》復刊21，頁1～26。

[10] 劉翠溶《臺灣史部分引言》，《中國歷史學會會訊》70&71（臺北，2002.11.30），頁20～22。

[11]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頁36～43。

[12] 李東華《二十年來臺灣中國史研究趨勢之我見》，《中國歷史學會會訊》70&71（臺北，2002.11.30），頁22～24。

[13] 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出版，2002。

[14] 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年：傳承、方法、趨向》，xiv～xvii。

軌跡，亦有臺灣史學工作者內省的自覺。外來的影響包括日本史學、現代中國史學與歐美史學；內省的自覺包括對方法與方法論的反省（日本史學、現代中國史學與歐美史學的本土化），研究範疇的轉變（如1990年代臺灣史研究的興起）。上述論著對臺灣史學在史學理論、方法與方法論、歷史解釋的檢討，勾勒出一幅鳥瞰式的圖像，對了解臺灣史學提供了基本的趨勢導引。

彭明輝教授的系列量化分析指出，臺灣地區的史學研究，中國史占有極大比重。在《臺灣地區歷史學期刊論文與博、碩士論文的量化比較（1945～2000）》中，選取《大陸雜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史學集刊》、《史學評論》、《思與言》、《幼獅學誌》、《食貨月刊》、《新史學》等八種期刊為分析對象，並以1945～2000年間的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為參照客體，分析兩者的內容取向與關注課題。在搜集到的2008篇博、碩士論文中，中國史占73.0%，臺灣史占15.9%，世界史占11.1%；八種期刊搜集到的論文計5683篇，中國史占87.3%，臺灣史占4.9%，世界史占7.9%，略可看出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重心之所在。<sup>[15]</sup> 另一篇分析歷史學報的論文，搜集到的二十種歷史學報論文計2378篇，中國史占80.6%，臺灣史占7.9%，世界史占11.3%，亦可說明臺灣史學的研究重心為中國史。<sup>[16]</sup>

整體而言，臺灣史學在理論與方法論部分頗受外來學說之影響，研究課題主要集中於中國史。臺灣史研究一直要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臺灣地區解除戒嚴，才成為史學研究的新興領域。

## 二、反思與前瞻

搜錄於本書第一卷“反思與前瞻”的六篇論文，整體回顧與檢討了1945年以後臺灣史學的諸種面貌。

[15] 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取向：一個計量史學的分析（1945～2000）》，《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2002），頁151～206；彭明輝《從歷史學期刊論文分析臺灣史學研究動向（1945～2000）》，《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臺北，2002.05），頁335～364；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學期刊論文與博碩士論文的量化比較（1945～2000）》，《漢學研究通訊》21.2=82（臺北，2002.05），頁1～16。

[16] 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學報的量化分析（1945～2000）》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1（臺北，2004.05），頁193～234。

余英時教授的《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史學評論〉代發刊辭》，首揭現代中國史學史料與史觀學派分庭抗禮之說。余英時教授指出，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先後曾出現過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響最大的則有兩派：一派是史料學派，係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訂與辨偽為史學的中心工作；另一派是史觀學派，乃以系統觀點通識中國史全程為主要任務。余英時教授認為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發展，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但現代中國史學卻走上分途發展之路。因此他希望現階段的史學工作者能夠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一方面用嚴格的實證方法建立史實，另一方面則要通過現代各種學科的最新成果和時代的眼光，來疏通史實與史實之間的關係，以解決“證而不疏”和“疏而不證”的問題。<sup>[17]</sup> 此文原係《史學評論》的代發刊辭，刊出後引起甚多回響，兩岸學者探討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不論贊成或反對，大抵均在余英時教授《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的基礎上進行討論。

黃進興教授的《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說明自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以來，垂一世紀間“新史學”的諸種面貌。黃進興教授指出，梁啟超一面將史學從經學的附庸獨立出來，卻又迎向社會科學的附庸，使得“新史學”扶得東來又西倒；而同時代的學者，胡適與傅斯年強調史料的重要性，終落得“史學只是史料學”的結論；何炳松在引介美國哥倫比亞新史學派魯濱遜的《新史學》時，又不免以社會科學為史學開藥方。黃進興教授指出，中國第一代的新史家在引介其他學科進入史學的過程中，漸次暴露史學無法自主的弱點。自此中國史學洞門大開，外敵（案指西方史學與社會科學）得以長驅直入，擾攘永無寧日。而第一代的“新史學”與社會科學聯盟，便如清兵入關，不可收拾。自此現代中國“新史學”便棲棲遑遑，無所安頓；從1920年代社會科學的引進，到歷史唯物論（大陸）、行為科學（臺灣）的盛行，其中除了夾雜美、蘇文化霸權的驅策，都只能視為時尚的差異。因此，黃進興教授呼籲，今日的史學研究，必須重新省視中國歷史素材，從中創發量材適身的研究途徑，以求真正提昇

[17] 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此文係《史學評論》的代發刊辭，收入：余英時《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頁1~29；此處所引在頁2、4、27。

對中國歷史的理解，建立別具特色的史學。

陳弱水教授的《傳統中國史研究與臺灣史的未來》，論析臺灣史學的四個問題：（一）傳統中國史研究在臺灣的人文學術中應有怎樣的地位？（二）臺灣的中國史研究可以採用何種戰略？（三）臺灣的中國史研究應如何揚長避短？（四）如何運用相關的研究資源？陳弱水教授指出，相對於中國大陸的中國史研究，臺灣的中國史研究乃屬邊緣地區，故應有良好的研究策略；雖然今天臺灣應努力建構臺灣史的研究，開拓世界史的研究，但中國史仍應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臺灣研究中國史，最有潛力的方向應為“現象解釋”。陳弱水教授認為，“現象解釋”以實證的研究為基礎，抉發出有助於了解重大歷史問題的現象，進而描述此現象，說明其與重大歷史問題的關係，亦即一種涵蓋歷史解釋（historical explanation）的研究。

林正珍教授的《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1950～2000》，全面回顧和檢討了1950～2000年間臺灣史學有關史學理論的引介，對臺灣史學過度向現代化、科學化傾斜的現象也有所評驚，與此同時，亦對在科學化風潮之下，使得文學或藝術想像與史學產生距離的現象有所批評。

王汎森教授的《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從新文化史對思想史研究的衝激，討論研究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包括：（一）對私密性史料的重視與利用，強調地方性思想文化材料的重要性；（二）探討方法論的問題，釐清“事件的邏輯”與“史家的邏輯”，對布洛克（Marc Bloch）主張研究古代歷史要像“倒著放電影”的論述提出修訂，認為研究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在方法論上應該是“順著放電影”；（三）提出中國近代傳播網絡的形成與思想文化之關係，如保守派人物研究、地方上小讀書人的角色與功能之研究。但王汎森教授最後仍強調，思想史研究的最重要工作，是對重要文獻縝密而深刻的閱讀。

王明珂教授的《民族史的邊緣研究：一個史學與人類學的中介點》，提出有異於溯源研究的邊緣研究。民族史的溯源研究，係指著重於構成一個社會體系的“內涵”，主要以尋找“內涵”之“相似性”為主的類比法。民族史的邊緣研究則是邊緣的、不規則的、變化的族群現象。王明珂教授指出，人群定義“同我”是以將“非我”排除在人群邊



緣外來達成，並以共同的稱號與共同的起源來設定族群邊界，而族群認同的改變，也是以族群邊界的變遷來完成。因此，民族的溯源研究，必須先假設民族是具有共同或相似的血統、語言、文化的人群，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或曾經存在的“民族”。而民族史的邊緣研究則認為，脫離主觀認同，沒有所謂客觀存在的民族。這種邊緣研究的思維架構，在民族史的溯源研究之外，另闢蹊徑，開拓出民族史研究的新天地。

搜錄於本書第一卷“反思與前瞻”的六篇論文，大體勾勒出 1945 年以後臺灣史學的諸種樣貌，顯示外來衝激與內省自覺對臺灣史學所造成的影響，殊非單一因素所能解釋，亦由此呈顯臺灣史學多樣化的現象。

### 三、方法與方法論

學者們反思臺灣史學的形成，大抵同意戰後初期的第一代史學工作者，受現代中國史學的影響極為深遠。故自梁啟超 1902 年發表《新史學》以來，方法與方法論即成為一代代史學工作者念茲在茲的事。其中以傅斯年 1928 年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為基地的史料學派，1960 年代與 1970 年代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聯姻，1987 年臺灣地區解嚴後臺灣史研究的興起，1990 年代以後新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的出現，是臺灣史學方法與方法論意識高張的關鍵年代。

黃進興教授的《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對近、現代中國史學強調“方法”與“方法論”的現象，有鞭辟入裏的論析。黃進興教授指出，近代中國史學對“方法”的提倡，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1933），為蕁路藍縷之作。<sup>[18]</sup>稍後的胡適更是提倡“科學方法”的燃燈人，主張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但他的整理國故和科學方法其實很有科學主義的意味。<sup>[19]</sup>在科學主義的涵蓋之下，“科學方法”幾近無所不能；歷史研究顯然屬於“國故”的一部分，

[18] 黃進興《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收入：康樂、黃進興（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1），頁 21 ~ 42；所引在頁 25。

[19] 郭穎頤（D. W. Y. Kwok），*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 ~ 1950*（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林毓生（Lin Yu-sheng），*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pp. 91 ~ 92。